

## 論袁枚及性靈派的考訂詩創作 ——兼談考訂詩對比興傳統的反撥<sup>1</sup>

葉偉璋<sup>2</sup>

**摘要：**袁枚對考據甚多批評，認為詩家從事考據，會影響詩人氣質。其實，袁枚並不反對源於性情，根於學問的以考據入詩，他反對的是以考據替換詩歌，改變詩人性情的做法。所以，袁枚以至性靈派詩人都有考據入詩的作品，而這也是乾嘉詩壇的風尚。從詩形上看，這些詩歌缺乏比興，罕見詩人性情，一直遭到批評，在文學史和詩歌選本中亦幾近失蹤。袁枚及乾嘉詩人不會不知道這種詩歌跟托物寫志、比興寄托的咏物詩大異其趣，他們有意識地進行這種詩歌實驗，嘗試新的寫物方式。考察這種充滿張力的書寫和批評現象，可以看到比興傳統之強大無比，如何影響詩歌之流傳，及詩人進行詩歌實驗時的顧慮、掙扎與變通。

**關鍵詞：**袁枚、考訂詩、比興、咏物

<sup>1</sup> 收件日期：2021/04/30；修改日期：2021/08/18；接受日期：2021/09/11

<sup>2</sup>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 The Writing of Kaoding Poem by Yuan Mei and Xingling School, and The Repulsion of Kaoding Poem to the Bixing Tradition<sup>3</sup>

Yip, Cheuk-wai<sup>4</sup>

**Abstract:** Yuan mei is known by his criticism of evidential research, as he claimed that the engagement in evidential research will exert inference on the soul of a poet. Yuan Mei indeed did not reject the poetry referencing the clarification of knowledge, but disliked the replacement of poetry by evidential research, which lead to changes of poet's style. Hence, Yuan Mei, as well as poets from Xingling school, also produced poetic works referencing evidential research, which was a fashion in the Qianlong-Jiaqing-period.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poetic style, the lack of both Bixing (analogy and metaphor) an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e works of Kaoding poetry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a long time, so that Kaoding poetry is hard to be found among writing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selective readers of poetry. Yuan Mei and poets in the Qianlong-Ji-aqing-period must know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ch the poetry genre and the yongwu (thing) tradition, which trends to deliver lyrical

---

<sup>3</sup> Received: April 30, 2021;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18, 2021; Accepted: September 11, 2021

<sup>4</sup>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pressions through things and Bixing. Through a number of experimental poetry writings, those poets aimed to develop a brand-new method of literary writing of things. By exploring such the intensive writing style and criticism history, we can find that the dominance of Bixing tradition is so powerful that poetry genres out of the mainstream usually fade away. We can also see the concern, struggl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ets within the process of poetic experiment.

**Keywords:** Yuan Mei, Kaoding poetry, Bixing, Yongwu

## 一、引言

袁枚（1716-1797）在文集、詩話、尺牘中經常攻擊考據家。他對考據的攻擊是多方位的，幾可說是全盤否定；他認為，在學術史中，考據零碎，對學術毫無助益；詩歌中，考據扼殺詩人天才；即使在個人修養裡，考據也只會讓人的靈氣消磨殆盡。袁枚對考據的痛恨，看來表示了不欲跟其沾上任何關係的決心，甚至有親者痛仇者快的憤慨。<sup>5</sup> 關於袁枚對考據家的批評，性靈說與學力的關係，前賢已論之甚詳，亦已指出了袁枚論詩時的正反兩面性，及其喜歡翻案的個人偏好。<sup>6</sup> 然而，袁枚對於考據的厭惡溢於言表，也不存在為其翻案的念頭。前賢如郭紹虞、楊鴻烈等已發現袁枚論詩雖不廢學，

---

<sup>5</sup> 袁枚的批評語調有時甚激越。例如指考據者「不過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閑則可耳，有識之人，斷不為也」袁枚著，夏勇注釋：〈寄奇方伯〉，《小倉山房尺牘詳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378。又如指時人以考據為詩「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髮僧，如拆袂線」。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上冊，卷5，頁146。

<sup>6</sup> 郭紹虞與張健的觀點見下文，暫不贅。又，濱口富士雄有〈袁枚與考據〉一文，他指袁枚主張性情，承接明代羅汝芳「赤子之心」及李贄「童心說」，考據在古紙堆中埋首限囿了詩文的性情表現及創造性。但濱口亦指出袁枚是尊重學問的，主張「明其大義」而放棄瑣屑之追求。此文最後提到戴震、程廷祚的影響，是相關研究比較少觸及的部分。濱口富士雄：〈袁枚と考據〉，收入內山知也博士古稀記念會編：《中國文人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91年），頁287-300。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游網絡的研究》有「圍繞『著作』與『考據』的論爭」一節，述說了袁枚與孫星衍之間的筆戰，並附焦循及章學誠的反應，甚有參考價值。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游網絡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249-260。

但考據和學問在袁枚而言並不相同，性靈與考據也是互相排斥，無法共存。本文無意在此重複論證，亦不以性靈說為研究旨趣。本文希望藉袁枚及性靈詩人的援考據入詩現象（後文會稱這類詩作「考訂詩」，命名原因會在第三節說明），說明詩人是清楚知道這種詩形跟其他詩歌的區別的；換言之，他們是出於自覺創作的。本文將以性靈為方法，探析這種詩的詩形特點及創作論。我們將發現，性靈派詩人對考據的批判和以考據入詩的創作實踐，為考訂詩的寫作價值創造了更具廣度的思考框架，而讓我們不必僅僅聽信考據家的自我宣傳。<sup>7</sup> 這類詩歌在當時的流行，自有其乾嘉實學背景，亦關乎知識分子所經營的文化圈子之權力機制。<sup>8</sup> 相比外部因素，本文更希

7 這類詩歌不乏讚許聲音，特別是翁方綱的朋友和後學。例如陸廷樞稱賞翁方綱的詩歌「覃溪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攷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雖所服膺在少陵，瓣香在東坡，初不以一家執也」，陸廷樞：〈復初齋詩集序〉，收入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1冊，頁1。徐世昌亦稱譽翁氏詩：「覃溪以學為詩，所謂瓴壁木石，一一從平地築起」、「且其深厚之作，魄力既充，韻味亦雋，非盡以鬪靡誇多為能事。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玦珎。』讀覃溪詩，亦作如是觀耳」，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30冊，卷82，頁674。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談翁方綱時云：「他的詩作也往往不厭其煩地描述金石學、書法、繪畫或文本的具體個例，或自述其學術上的沉思冥想和辛勤勞作。翁方綱顯然希望這些主題也能夠反過來幫助塑造其獨特詩風」，也嘗試勾勒這種詩歌的正面意義。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頁263。

8 葉倬璋指出翁方綱、王昶等人掌握京城文化話語權，他們好以金石考據入詩，後生士子來京後，為打入這個圈子，多寫作考訂詩。葉倬璋：〈文物之光下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政大中文學

望分析這類詩如何跟詩學傳統牴牾，其獨特詩形與接近「零度」的創作論，以至於其在熱潮過後迅速失蹤在詩史研究的原因。考掘一種已經退場的詩歌，切換創作本身與語境的視角，可觀察到詩歌創作與評鑑、如何難以迴避立乎其先且又強大無匹的詩學傳統，使價值判斷變得不容置辯而又掛萬漏一。

## 二、袁枚反對考訂詩嗎？

1938 年，郭紹虞在《燕京學報》發表了〈性靈說〉一文，點出了袁枚性靈說的包容性和兩面性，特別強調了隨園詩論「重在真，不廢學」的特點：

我們須知道隨園論詩雖重天分，然而却不廢工力；隨園作詩雖尚自然，然而却不廢雕琢。他正因要防範這種真而帶率新而近纖的流弊，故其論詩，天分與學力，內容與形式，自然與雕琢，平淡與精深，學古與師心，舉凡一切矛盾衝突的觀點，總是雙管齊下，不稍偏畸的。這樣講性靈詩，然後有性靈之長，而沒有性靈詩的流弊。<sup>9</sup>

---

報》，第 28 期（2017 年 12 月），頁 103-140。寧夏江、魏中林認為以翁方綱為首的考據詩派的詩學觀，挾裹著政治機術。他們論詩須以闡揚「國朝文治之光」為目的，詩歌的寫作和審美都須納入『稽古右文』的封建專制文化的圈子中。這種論調是對詩人自在的心靈和詩歌的抒情特質的壓抑和侵蝕。所以乾嘉考據詩風「對『文治』背後所隱藏的專制恐怖作了文化人特有的屈服。」寧夏江、魏中林：〈袁枚批判乾嘉考據詩風的反封建意義〉，《中州學刊》，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222-225。

<sup>9</sup> 郭紹虞：〈性靈說〉，《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上編，頁 480-481。稍早於郭紹虞，楊鴻烈在《袁枚評傳》已指出袁枚主張作詩以性靈和學問並重，但還是偏重在性靈方面，他列舉了

以學問濟性情，以人巧濟天籟，是袁枚接受及調和前人詩說的要旨。因為他的說法「接受以前一切詩論，同時又破除以前一切詩論」，郭氏認為這是面面俱到，是「一種比較完善的純粹詩人的詩論」。這篇文章在袁枚和性靈說研究史上非常重要，一方面梳理了性靈說的淵源，一方面照顧到袁枚性靈說與清初及當時其他詩說的關係，大抵奠定了後來的研究格局。至於考據，郭氏此文談得不多，但已指出了隨園雖喜博覽，也談考據，然不免蕪雜，不免浮淺的個性。郭氏是從袁枚對「學」的態度角度來處理這問題，固然，考據是「學」的一種，但如果「視考據為學」，就容易將之等同於書本學問、積材用典、談經說理，在接續嚴羽「詩有別才，非關書也」的話語中，模糊了考據作為乾嘉學術時尚、對詩歌產生獨特影響的重要性。本文認為，我們必須更清晰地辨析「以學為詩」和「以考據為詩」的區別，即使二者是一組上、下位的概念，否則會混淆袁枚以至其他論者對考據和考訂詩的評論。

「以學為詩」在宋代以後論辯不絕。最常見的是嚴羽《滄浪詩話》針對江西詩派以學問為詩的現象，批駁他們喜用僻典澀詞，以學逞才。<sup>10</sup> 另外，理學家的性理詩，由宋代之邵康節至明代陳白沙

---

袁枚論學問的文本，附簡要分析。楊氏的評傳在 1925 年《晨報副刊》分三期發表，其後編訂成《大思想家袁枚評傳》，1927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 1933 年收入王雲五主編的「國學小叢書」，易名《袁枚評傳》。楊鴻烈：《袁枚評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176-177。

<sup>10</sup> 關於《滄浪詩話》對江西詩派的批評，學界成果已多，其中郭紹虞和張健都發表過具代表性的研究。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詩辨》「詩有別才」下釋，嚴羽此說重在糾正時弊，江西之「去俗」、重學主張，法嗣承風，更走極端，故嚴羽針對此風而發論。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3-34。張健《滄浪詩話校箋》收納現代諸家論說，如王達津認為嚴氏別材別趣之說不僅針對江西詩派，

等理學家，以理語入詩，在宋以後的詩論家眼中卻只是「理障」<sup>11</sup>。明清兩代，「以學為詩」也可以泛指宋詩，在詩論家論詩話語中作為反面例子存在。<sup>12</sup> 要之，「以學為詩」的話語有寬狹之別，既在詩家園地，亦廣泛見於不同派別的詩人，「學」與「詩」的關係在此是不得不辯的。論辯之結果不僅影響詩之語言和作法，亦關涉到

還包括蘇軾和孟浩然的。又錢鍾書指別材與非關書針對江西詩派，別趣和非關理則針對理學詩派，張健讚之為特識。張健自己則指出，江西之詩學論說中，讀書對詩歌的作用有：（一）涵養性情、提高人格修養；（二）提高詩歌鑒賞力，從而提高創作水平；（三）積累詩材，為用典。他說嚴羽排斥的是第三點，在第二點方面嚴羽和江西是有一致性的。張健：《滄浪詩話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上冊，頁130-137、146。

- <sup>11</sup> 理障、理趣討論。當代有論者專研哲理詩的理趣，分析觀照自然下之美學體驗，如鄭龔子：〈自然與中國古典詩歌的理趣〉，《人文中國學報》，第23期（2016年12月），頁31-60。就宋人主理背景而言，李澤厚曾指，宋人重理普遍體現在哲學、詩歌、藝術以至自然事物，是一種共同的思想傾向。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李澤厚十年集1979-1989》（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3卷上，頁229。
- <sup>12</sup> 例如明代復古派的論說，就有排擊宋詩與性理派的意圖，後期復古派更有檢討往代詩歌之文學史意義的特點。由於宋詩風格偏離唐詩，明人就屢屢以宋詩為殷鑒。參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7-64。清初雲間派陳子龍對晚宋與晚明的詩風同樣鄙夷，「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夫」。陳子龍：〈幾社王申文選凡例〉，《陳忠裕公全集》，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上冊，頁667。陳子龍在另一篇文章說「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安雅堂稿》，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下冊，頁55。後來吳喬引述《詩法源流》，說宋人以文為詩、主於議論，故離《三百篇》遠。吳喬：《圍爐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卷2，頁519。



詩之本質。嚴羽「別才」、「別趣」之說就從詩之根本——性情，去確立性情為中心那不可被「學」顛覆的重要性。這種討論延續力強，詩歌語言亦易於呈現不同程度的「學」，例如「用事」本身便是詩家常論的話題，亦頻繁見於「以學為詩」的討論。<sup>13</sup>至於對於理學家的以理語入詩或性理詩，論者處理方法極之簡易，將之驅離或無視便可以了。四庫館臣云「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於文

<sup>13</sup> 張戒說「詩以用事為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以押韻為工，始於韓退之，而極於蘇、黃」，他認為學詩者焦點錯置，「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上，頁16。用事既需學問，亦要技巧，故蔡條《西清詩話》以杜詩為例，說用事乃「詩家密藏」。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87。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多錄宋人之論用事，可參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10頁66、卷22頁144-145、卷38頁257、卷40頁271-272。元代楊載《詩法家數》有云：「詩結尤難，無好結句，可見其人終無成也。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譏人不可露，使人不覺。」楊載：《新刻詩法家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6冊，頁64。王世貞《藝苑卮言》引釋皎然語說「詩有四深」，其中包括「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冊中，卷1，頁954。後來王夫之更說「用事不用事，總以曲寫心靈；動人興觀群怨，卻使陋人無從支借」。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2，頁122-123。晚明胡應麟《詩藪》甚多相關論述，例如云「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為理縛，理障也」，但他並不以用事為詩歌衰敗的原因，他認為有「用事之工」和「用事之僻」，及「詩自模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2頁39、卷4頁64。

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究謂之『別派』<sup>14</sup>，「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sup>15</sup>，說明了這種二分現象：理學家貶低詩家「閒言語」，詩家亦寫不出「擊壤體」那樣的性理詩。各說各話，各不相服，互不相侵，互不承認。這樣，這種詩的影響力自然有限，無法衝擊詩之本，何況性理詩從未形成廣泛的寫作風氣。

那麼「以考據為詩」是否可被以上所述之「以學為詩」收納？學界的相關討論大致上反映這種傾向；而且，考據作為「學」之一種（不論漢宋），詩人多兼學人，學人之詩和宋詩風氣長期佔據清代詩壇，視之為「以學為詩」的一部分是理由充分而且合乎現實的。袁枚對考據家的批評甚多，其詩家與考據家並置的言論，成為學界評論考據之弊時最常引用的文獻。例如他寫給奇豐額的尺牘，對比了考據之學和賦詩作文的分別：

但考據之學，枚心終不以為然。大概著書立說，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賦詩作文，都是自寫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醜雖殊，而不同則一也。考史證經，都從故紙堆中得來，我所見之書，人亦能見；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雖費盡氣力，終是疊床架屋，老生常談。<sup>16</sup>

他認為考據只是「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閑則可取，有識之人，斷不為也」，用辭不可謂不激烈，然能否見自己面目是他比較優劣之

<sup>14</sup> 〈薛文清集提要〉，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冊，卷170，頁503。

<sup>15</sup> 〈濂洛風雅提要〉，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第5冊，卷191，頁120。

<sup>16</sup> 袁枚著，夏勇注釋：《小倉山房尺牘詳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卷7，頁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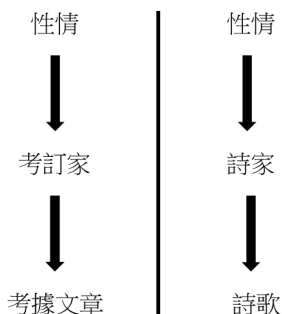
準的。再看以下幾段來自《隨園詩話》的詩話，先是：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於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襪線，句句加注，是將詩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吟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sup>17</sup>

這是在此話題裡，其中一則曝光度最高的詩話，所引之論詩絕句，學界多認為批評對象是翁方綱，即乾嘉「以考訂為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詩話指出「滿腔書卷」的人，當從事考據，不應借詩賣弄。如此順理成章地演繹出袁枚不廢學、討厭考據家以考據為詩、為詩應以性靈才情，而非堆垛學問等觀點。也許我們可以注意一下詩、性情、考據之間的邏輯關係。其一，袁枚認為「詩」與「考據」都可以是才情運使的平台，「詩」與「考據」是同級但互不相干的。所以不同才情的人，可以藉不同平台去發揮，學問家以詩去發揮才情，是走錯門徑的。其二，「言詩之必根於學」，「學」與「詩」有源與流、根與葉的關係，二者不是同級關係，「詩」自然可以從處於基層的「學」去汲取營養。他不滿的是「瑣碎零星」的「將詩當作考據」，即是學問家走錯門徑後，然後以同級但不相干的「考據」替換了「詩」，以彼易此下，「詩」就會被消滅，將「詩」等同於「考據」，是以袁枚會對他們如此痛恨。然而，李義山「才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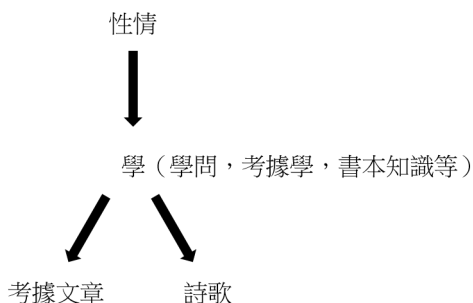
<sup>17</sup>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上冊，卷5，頁146。

驅使，不專砌填」的例子卻表示了一種「詩」與「學」共存的關係，就是當「詩」收納「學」，受詩人才情運使，那「詩」則較「考據」高級，切合他對「詩」與「學」源流根葉關係的理解。所以，袁枚是沒有否定「以考據做詩」的，只要切合源流根葉關係便可，而關鍵在於人之性情是詩人還是學問家。兩種關係請見以下二圖：



圖一：性情、詩、考據的第一種關係（同級但不相干）

圖一表示的是「詩」與「考據」各不相干的關係，人各有不同性情才能，順之而事考據、寫詩，不相雜廁。



圖二：性情、詩、考據的第二種關係（源流根葉）

圖二表示「學」得到「性情」的支撐後，可以事考據、也可以寫詩。「學」是學問，包括考據學問、書本知識。

以上兩種關係，有助我們把握袁枚對考據詩真正態度。他在詩

話多處演繹著相同的邏輯。例如另一則：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予以為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群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考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為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sup>18</sup>

此則詩話中袁枚親歷考據的自述廣為論者引用，以證明袁枚反對考據。若套用上文提到「詩」與「考據」的兩種關係，袁枚這則開首至「非親歷不知」之自述屬第一種關係，即二者同級但不相干，故袁枚以詩人之才情，誤入考據，自然難以運使才情，怎會不苦惱不已。引文「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較「非親歷不知」重要，「著作」（詩文）與「考訂」應該是兩不相侵的。引文後半段的自問自答，演繹的就是第二種關係，「有書而後有考據」表示這源流根葉關係乃先天存在，「著作」可以包容「考據」，但二者關係不可顛覆。而文本所見，袁枚認為「著作」、「詩文」、「詞章」是等同的。所以，袁枚這裡並沒有反對「以考據做詩」的。

再看以下一則：

<sup>18</sup>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上冊，卷6，頁186-187。

考據家不可與論詩。或訾余〈馬嵬〉詩，曰：「『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于長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然太不知考據者，亦不可與論詩。余〈錢塘江懷古〉云：「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或訾之曰：「宋室都汴，不可射也。」余笑曰：「錢鏐射潮時，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時都汴者何人，何不一考？」<sup>19</sup>

首句「考據家不可與論詩」，並不等於否定「以考據做詩」。觀袁枚之例證，他只在恥笑考據家缺乏詩家的識力，是從閱讀、批評層面上說，而不是從創作層面上說。而他自己的詩例，則重覆前述的「詩」與「學」的第二種關係（源流根葉），只有詩家可以恰如其分地在詩之平台駕馭「考據」。

上述第一種關係，成為袁枚品評人物的慣用邏輯。他屢屢為好友孫星衍專攻考據婉惜，因為他認為孫氏曾是詩家天才，但轉事考訂後卻「鋒銳小頹」、失去靈氣。袁枚的話是「緣逃入考據之學故也」，指孫星衍走錯門徑，錯以「考據」作為發揮才情的平台，最終連原有的「詩」之平台也失去。袁枚曾讚許毛奇齡和朱彝尊，說：

考據之學，本朝最盛。然能兼詞章者，西河、竹垞二人之外無餘子也。近日處素、諫庵兩昆弟，頗能兼之。處素將至長沙，遇順風，云：「江天如拭晚成晴，帆飽舟輕浪不驚。斜日風回草背落，殘霞猶映樹邊明。飯丸烏接神應助，沙觜風回草有聲。頻向篙工問前路，煙中指點武安城。」其他，五言如：「怪松連石長，歸鳥雜雲飛。」「星低疑在岸，月近

<sup>19</sup>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上冊，卷13，頁446。

總隨船。」「談淡蟲語續，人靜鼠聲來。」「浪花入船窗，添我硯池水。」七言如：「星光墮水白於月，樹色粘雲暗似山。」「荒寺鳴鐘驚鷺起，孤村喚渡少人應。」皆妙。<sup>20</sup>

他是說毛、朱二家兼擅「詩」和「考據」這兩個同級而不相干的平台，都能運使才情。試看他所舉的詩例，全部是詩家佳句，沒有一首是考據詩，故此，他不是說毛、朱二家能以考據入詩，袁氏只在表示毛、朱二家的「詩」的平台，沒有因為其兼擅「考據」平台而受到損害，他們依然能以「詩」平台運使才情，寫出詩人之詩的。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兩個平台需要不同的「資性」，正常人是不能相兼的。袁枚在《隨園隨筆》序的開首說：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踈濶，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本朝考據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予敢披膩顏恰，逐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sup>21</sup>。

這一段更清楚表示上述之兩種關係不可相混。從人的性情與選擇角度看，需循第一種關係（各不相干的平台），故走錯門徑後需要趕快抽身，敬謝不敏。但從價值判斷角度看「詩」與「考據」，需循第二種關係（源流根葉），故有形上形下之別，不可讓形下之「考據」，廁身形上之「著作」。他對自己歸屬於「著作」是相當

<sup>20</sup>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下冊，補遺卷2，頁607。

<sup>21</sup> 袁枚：〈隨園隨筆序〉，袁枚著，周本淳校點：《小倉山房續文集》，《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冊，卷24，頁1766-1767。



有優越感的，所謂「形上」「形下」不必過度詮釋，他只像前文引述的詩話般，表示只有詩家（著作）能夠駕馭「考據」，但「考據」不能反過來駕馭「詩」而已<sup>22</sup>。

以上幾則文獻，袁枚都對準「詩」與「考據」的關係發話，而非籠統的「詩」與「學」。他的觀點有著當下的個人關懷，不是純然文藝理念上的討論。考據曾讓他苦惱自己靈氣盡失、讓他的詩歌遭到非議、使他的好友由天才變平庸。若果以「學」來包綜他對考據的評論，與其他論用典用事的文字等量齊觀，就很容易模糊袁枚的焦點；亦不易發現，袁枚討厭的只是錯置「考據」與「詩」關係的人，他其實不討厭以考據入詩這種新興詩體。《隨園詩話》有一則詩話直接談及這種詩：

考據之學，離詩最遠；然詩中恰有考據題目，如〈石鼓歌〉、〈鐵券行〉之類，不得不徵文考典，以侈侈隆富為貴。但須一氣呵成，有議論、波瀾方妙，不可銖積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詩大概用七古方稱，亦必置之於各卷中諸詩之後，以備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撐門面；則是張屏風、床榻於儀門

---

<sup>22</sup> 張健指清代興起了學人之詩，受到了沈德潛及袁枚的抵制。他認為「真」與「雅」需要合一，前者是性情，後者是學問，要將學問消化吸收，鎔鑄成自己的語言。所以，性靈是能夠容納學問，與公安派的排斥學問不同。又認為袁枚詩學的立足點還是抒情傳統，是故對學問的容納是有限度的。一旦學問不以表現性靈服務，就會影響性靈的表現，變成堆垛學問。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65-768。梁結玲指袁枚將詞章提高到了「著」的高度，與經典並駕齊驅，而將考據放入了「述」的二流位置。這觀點在當時等於貶低了主流學術，也即是對經的解構。梁氏又指袁枚在考據與文學的緊張關係中看到了雙方的互補性，使得文學在乾嘉學術風氣中不失其風向。梁結玲：〈乾嘉學派與袁枚的詩學觀念〉，《文藝評論》，第4期（2011年4月），頁132-137。



之外，有貧兒驟富光景，轉覺陋矣。聖人編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何也？以《國風》近性情故也。余編詩三十二卷，以七言絕冠首，蓋亦衣錦尚綢，惡此而逃之之意。<sup>23</sup>

這一則詩話注意的人不多，有論者以此指袁枚認為只要適量和切入得好，考據詩也是詩歌大家庭中的一員。<sup>24</sup>早在唐代，韓愈已有〈石鼓歌〉，開拓了一種針對文化古物的歌行體寫作。這種題材除了尊崇韓愈的人有同題仿作外（如蘇軾），並未有成功引動寫作潮流，反而招到「怪特」、「尤歪風雅」的批評<sup>25</sup>；但到了清代，不少論者將韓之〈石鼓歌〉與杜甫之〈李潮八分小篆歌〉及蘇軾的〈石鼓歌〉相提並論，嘗試在「怪特」以外尋找更多能連結當下學風的論述方向。<sup>26</sup>本文認為，這一則詩話是罕有的考據詩創作論文

<sup>23</sup> 袁枚：《隨園詩話》，下冊，補遺卷2，頁615。

<sup>24</sup> 寧夏江、魏中林：〈袁枚的「詩」「學」觀〉，《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2009年12月），頁17-21。

<sup>25</sup> 黃震說韓愈〈石鼓歌〉、〈雙鳥詩〉為「怪特」。黃震：《黃氏日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07冊，卷59，頁465；陸遊也曾暗諷此詩之失雅，他說「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為可駭也。』基仲為之絕倒。」陸遊著，楊立英校注：《老學庵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卷5，頁178；洪邁亦以此詩指「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4，頁51。

<sup>26</sup> 沈德潛從隸書在唐時之流行指韓愈此歌並無貶抑王羲之之意。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上冊，頁246-247。王士禛《池北偶談》云「《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

字，是在考據詩大行其道時的即時反省，而這竟然出於一直被認作是考據敵人的性靈宗匠袁枚。他提到的幾點創作標準，也是當時考據詩的普遍特點，當然也是他曾攻擊的考據詩主要作者——翁方綱的考據詩特點。更有趣的是，袁枚對於翁方綱幾乎沒有好說話，論詩絕句之「詭癡」、「夫己氏」，一般都認為指翁方綱；一個連名字也不願提起的人，袁枚對他倒底有多大惡感？但在《隨園詩話》，竟然有一則提到翁方綱，兼且沒有貶抑意：

前明萬曆五年，常熟趙文毅公劾張江陵，廷杖謫戍。其友庶子許國銘兪觥為贈。蓋取神羊一角觸邪之義。後流傳數易其主。五世孫王槐探知在山左顏衡齋家，乃製玉觥銀船，托宮詹翁覃溪先生作詩，請易之，竟得返璧。一時題詠如雲。覃溪作七古一篇，後八句云：「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誓相報。觥喜多年逢故人，叟泣還鄉告家廟。昔人贈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兪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玉船。」<sup>27</sup>

他提到的是翁方綱〈兪觥歸趙歌〉，是考據之詩。所記之事在乾隆當時是文藝界盛事，不少詩人也以這題目創作以考據入詩的作品。這應該是袁枚對翁方綱唯一一則不予貶抑的詩話，而評論對象

---

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勅敵」。王士禛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下冊，卷13，頁318。刊於嘉慶年間的恆仁《月山詩話》，有回應王士禛的說法，指「余謂〈八哀詩〉固多敗筆，然大段自見峻嶒，不必過貶；薄雲句自是偶同，豈必竊古，何以韻勝。杜以警勝，不須輕軒，朱悔人〈花木六詠〉絕無新色，蘇子瞻〈石鼓詩〉實不及韓，阮亭之言非確論也」。恆仁：《月山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sup>27</sup>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上冊，卷14，頁468。

是這種考據之詩。<sup>28</sup> 加之，袁枚自己也有考據之詩（詳見下一節），看來他並不討厭這種詩歌的。如果套用前文提到「詩」與「考據」的兩種關係，考據之詩對於袁枚，正是第二種源流根葉的關係，是詩人駕馭考據後的產物，它是「詩」，不是「考據」，故不存在以「考據」替代「詩」的問題。

那麼，袁枚的考據詩，是否能夠抒寫性靈，運使才情呢？性靈派詩人亦多有考據詩創作，他們的詩歌如果跟翁方綱等人的詩有分別，那分別是什麼？考據之詩的詩形又是怎樣的呢？

### 三、袁枚及性靈派詩人的考訂詩創作

考據之詩是一種長期被文學史忽略的詩歌類型，它廣泛流行於乾嘉時期。翁方綱、畢沅等學問家詩人群是這種詩歌的主要作者，但其實考據之詩的寫作在當時流播甚廣，參與寫作的詩人遠不止京城的學人。例如浙派的厲鶚和杭世駿、布衣才子黃景仁、大詩人程晉芳等，都有這種詩作。由現在開始，本文會改用「考訂詩」指稱考據之詩。「考訂」一詞指考據訂正，自宋代起已有應用，<sup>29</sup> 大量

<sup>28</sup> 也有論者指袁枚對考據派的態度也不是全然否定，如寧夏江、魏中林指出袁枚一方面攻擊考據家，一方面又與此派中的個人交往密切，例如翁方綱門人謝啟昆和吳嵩梁等。即使對翁方綱，袁枚也肯定翁氏跳出拙重、做得靈巧之詩。寧夏江、魏中林：〈袁枚批判乾嘉考據詩風的反封建意義〉，《中州學刊》，第2期（2010年3月），頁222-225。

<sup>29</sup> 如晁公武《群齋讀書志》有「考訂歷代及本朝史志為甚詳」，晁公武：《群齋讀書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卷5，頁329；陳淳〈家禮跋〉「某嘗以語曲江陳憲而識諸編末矣，餘杭本再就五羊本為之考訂」，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14，頁610。黃翰〈與鄭成叔書〉「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舊書，

使用則在清代。章學誠有「考訂學業」、「考訂學識」之語，翁方綱撰〈考訂論〉三篇，清人編寫箋註時亦廣泛使用「考訂」，這當有示其依據材料訂正辨誤之意，這是考訂之一義。翁方綱說「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為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張惠言認為考訂之學是「實學」，需要「潛心讀注，勿求異說，勿好口譚」，<sup>30</sup>何秋濤說考訂之學能夠彰顯書籍之精詳，材料之互相發明，以求實求真，並非為了指斥前人瑕疵，<sup>31</sup>這皆可見清人對「考訂」的價值有相當高的自我期許。而且，翁方綱是以考據為詩的最重要推動者，他有幾百首考訂詩作品，也鼓動了同僚、朋友和後進參與考訂詩寫作。他談到詩歌跟考據時，多用「考訂」一詞，他亦積極將考訂的心得與發現寫成詩歌。故以「考訂詩」名之，可以突出這是清代學術背景下推動的特有寫作風氣，以及標舉翁方綱在這種詩歌類型的重要性；而當其他與翁方綱等人持不同詩學主張的人進行考訂詩寫作時，我們就不會忘記去思考他們的作品是否能跟翁氏等人的作品對話或比較，始終，一種考訂詩的寫作標準乃由翁氏等人確立。

考訂詩跟一般意義上的「以學為詩」不同，它有一個明確的考訂對象，多數是古物或者工藝品，也可以是石碑或遺跡。詩歌大多

---

稍足自適耳」，黃翰：《勉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卷 9，頁 102。

<sup>30</sup> 見張惠言：〈與陳扶雅書〉，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補編卷上，頁 193。

<sup>31</sup> 何秋濤：〈群書證誤敘〉：「臣秋濤謹案：考訂之學，後人多指前人之疵瑕，非前人之遜於後人也。載籍浩繁，抵牾難保，重加考證，始見精詳。故論辨之書，往往有互相發明者」，何秋濤：《朔方備乘》，《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卷 60，頁 201。

會對考訂對象的歷史和流傳作出考訂，也常有對它們的真偽和價值作出思考。這種詩興盛於乾嘉考訂學風下，它的寫法與咏物詩截然不同，上一節所引袁枚《隨園詩話》的一則，已道出了考訂詩在形式方面的普遍特點。至於它在性靈派參與時出現的詩學問題，及與咏物詩的分別，下文將會討論。

乾隆時，袁枚曾用「隨園派」一詞，<sup>32</sup>惟性靈派的「立派」出於現代學者之手。王英志指出，性靈派的成員組織比較散漫，只有袁枚、趙翼和張問陶等少數人可以算作骨幹成員。<sup>33</sup>他的《袁枚暨性靈派詩傳》，以比較包容的原則，劃出了「一支主力軍，兩支『偏師』」共六十餘人的龐大陣型。<sup>34</sup>王英志自言參照了錢鍾書的說法，<sup>35</sup>嗣後論性靈者亦對此派成員有不同的劃分，如蔣寅先生《清代詩學史》「性靈詩潮的回響」一章，就析述了乾嘉幾位性靈詩家的詩說，其中方薰和吳文溥二家是性靈派研究的新發現。蔣氏著力觀察幾家跟袁枚詩說的異同，論證性靈說在當時「擁有巨大的包容性同時，也埋伏著多種缺陷，論者的不同取徑暗示了對此的警覺」。<sup>36</sup>既然性靈詩說在乾嘉有著從定點向外幅射的能耐，那性靈詩家撰寫考訂詩，是否可以代表性靈能夠收編這一種「當時體」？或者從蔣氏觀

<sup>32</sup> 袁枚：《隨園詩話》，卷8，頁787。

<sup>33</sup>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

<sup>34</sup> 王英志：《袁枚暨性靈派詩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3。此書選了其中二十八家的詩歌。

<sup>35</sup> 錢鍾書《談藝錄》「袁蔣趙三家交誼」主要辨清三家齊名之說，及論說三家詩風及詩說之分合，不是標榜「隨園派」。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37-139。

<sup>36</sup>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學問與性情（1736-17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481。

點的相反處看，這種詩是否也埋伏著優點，為當時詩人所警覺？但為後人忽略？

被劃為性靈派的袁枚、趙翼、張問陶、孫星衍、舒位、楊芳燦等人集中都有考訂詩，其中趙翼的考訂詩數目相當不少。以下從袁枚開始，進行不同層面的比較閱讀。請看他的〈商丁孫尊歌為素將軍作〉：

素公雙瞳今罕有，辨古器物如犀剖。雞匱魚甌羅成行，就中商尊尤冠首。規身環濤束半腰，侈口吞舟容一斗。紅搖赤水珊瑚明，翠凝碧瓦琉璃厚。蛟龍揚爐鳧氏鑄，丁曰孫三字垂非。陰花陽篆劃深雪，雷紋雲氣蟠蝌蚪。黃目睽睽當臍瞪，飛廉嚙嚙繞腹走。想當元女降生商，兄癸婦庚鑄彝白。大扃七個橫廟門，典寶一篇陳黼右。媵臣負俎說調羹，成湯嫁妹狄作酒。或盛菹鬻彤祭日，或斟雉羹彭鏗叟。史官高勢來峩峩，稱祝尊前再拜手。道是器成永寶用，子孫無疆王萬壽。三腹有玉盤有銘，同與此尊垂遠久。一朝膜畫封河陽，白馬人行器不守。麥秀空傳箕子歌，銅盤早蝕比干紐。三千年過太陰中，不知有周秦更否。神物數滿當出世，咸陽耕夫傳某某。苔皴土繡形離奇，達官蔑視等瓦缶。素公一見購百緡，如辨墳羊識土狗。召良工某刷作瓶，月洗黑雲光照牖。沃丁武丁靈爽存，猶銜花枝香滿口。甄邯威斗子尾犧，若數班行都列後。我乃撫尊長嘆息，世事輸君常八九。函牛之鼎當康瓠，折鉤之喙享敝帚。人才那得如金銅，長在泥沙不速朽。願公愛士如愛尊，毋使埋淹嗟不偶。<sup>37</sup>

<sup>37</sup>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15，頁349。

這首詩擁有考訂詩的詩形，七古、大量材料填塞、以古物「商尊」為對象，描寫它的外形特徵（「規身環灑東半腰」至「飛廉嚙嚙繞腹走」），考訂其來源、應用（「想當玄女降生商」至「白馬行人器不守」），敘寫其被素將軍發現的經過（「麥秀空傳箕子歌」至「若數班行都列後」），最後發抒感嘆。素將軍是古器的發現者，是它能重現人間的原因，袁枚以借題發揮，祈望素將軍「愛士如愛尊」，別讓賢才埋沒。這種收束方式有如咏史，寓訓於事，由袁枚的「長嘆息」引出。讀考訂詩若只關注抒情，將會失望，因為這只佔很少篇幅，亦多出現於詩之結尾，與詩的其他部分不一定構成有機結構。假如以考訂為要，這種結尾即使割捨，也不會有影響。事實上，許多考訂詩也沒有這種尾巴，袁枚此詩以八句結尾，已是相當罕見。古器的外形、故事與重現人間的經過才是此詩的焦點。亦因此，考訂詩多用賦，「規身環灑東半腰」至「飛廉嚙嚙繞腹走」是賦形，描劃古物外形特點。「想當元女降生商」至「銅盤早蝕比干紐」是賦史兼以賦事，詩人想像古物在不同歷史場景中流轉，鋪寫其可能見證的歷史，徵實與否並非詩材選擇的決定性指標，因為這難以驗證。

袁枚大約有十首考訂詩，寫作時期廣及青年至晚年。另一首〈永建五年雙魚洗歌〉：

徐君龍飲貽我雙魚洗，中有永建五年銘。內府寶造用九字，篆初變隸陽文精。土花漬久翠的爍，水銀湧過光清瑩。考建元年乃漢順，其時擁立由孫程。十九奄人輿毆血，安知不將此洗盛。厥後洛陽火德改，家家呼唱董逃行。長安鐘簋盡灰燼，此洗何幸全其形。鬱湮坻伏向何處，一朝古貌山中呈。傷哉中郎喪老成，得見虎賁如典型。何況此物真漢器，閱歷



人世千餘齡。我學子訓摩銅狄，更慕圖澄解塔鈴。欲詢往事  
再三扣，雙魚作答聲丁丁。<sup>38</sup>

詩形與前一首相似，也以賦為主，先賦形後賦史兼事；詩人性情在詩中不顯，抒情感嘆之結尾流於形式。這種結尾方式在考訂詩很常見，即以雙魚洗考訂詩而言，例如裴垚〈古洗歌〉結以「神物顯晦各有以，豈有名寶終棄捐。人生遭際一如此，聽我長歌古洗篇」。<sup>39</sup>古物歷史與用途的辨識，需要專門考訂知識，是以這類詩歌多用僻典及書本材料，如此詩「十九奄人輿豸血」指東漢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順帝後封侯之事。東漢《東觀漢記》記孫程是衛康叔之冑孫林父之後，<sup>40</sup>此句「輿豸血」即出自《史記·衛康叔世家》衛莊公潛行回國之事。<sup>41</sup>「我學子訓摩銅狄，更慕圖澄解塔鈴」之「子訓摩銅狄」用《後漢書·薊子訓傳》故事，「銅狄」指秦鑄銅人<sup>42</sup>。「圖澄解塔鈴」是十六國漢趙劉曜率兵攻洛陽，石勒向高僧佛圖澄問事，圖澄以佛塔鈴聲預言之事<sup>43</sup>。這些事典於其他詩歌並不常見，而考訂詩則普遍應用僻典，造成學問化的特點<sup>44</sup>。

<sup>38</sup>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第 2 冊，卷 26，頁 668。

<sup>39</sup> 裴垚：〈古洗歌〉，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2 冊，卷 125，頁 214。

<sup>40</sup> 班固等撰：《東觀漢記》（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年），卷 20，頁 190。

<sup>41</sup>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5 冊，卷 37，頁 1935。

<sup>42</sup>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卷 82 下，頁 2745-2746。

<sup>43</sup>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第 9，頁 348。

<sup>44</sup> 寧夏江、魏中林讚賞袁枚考據詩數量雖少，但比起乾嘉時期其它考據詩，



再看趙翼〈于闐玉歌〉：

驛馬奔車汗流足，將軍遞到于闐玉。大小磊落三十顆，生牛皮裹牢結束。白作截肪青蔚藍，瑩澤皆如水新沃。觚稜初曉肅奏進，光映朝霞炫人目。此邦遠隔玉關西，洪荒以來未內屬。崑崙西流入其境，分三玉河烏白綠。少時讀史疑天外，何處西域三十六。張騫使節空經臨，呂光兵威未降伏。豈知今日入版圖，周索新恢過身毒。此玉遂充方物貢，水漲撈來不煩督。足規我朝德威溥，地盡九垓悉燾育。君不見天寶初載索西贖，興師勃律武功贖。裹糧轉戰四萬人，海激成冰一朝覆。又不見大觀年間造八璽，遣使往求幣滿篋。答書竟號獅子王，國寶雖成國體瀆。卽今網載來輪蹄，習見翻似豐年穀。試披往牒徵典故，此事古來見者孰？傳之史策垂無窮，應笑漢家侈叩竹<sup>45</sup>。

及孫原湘〈宋宮團扇歌〉：

團扇流傳宋時久，翦雪裁霜絹不朽。秋風冷落一千年，明月依然落人手。可憐扇作月輪圓，不比金甌闕半邊。輸罷歲繒三十萬，零紉賸綺尚鮮妍。水田幾稜清溪繞，誰寫南朝風景好。翦取杭州作汴州，西湖自大朝廷小。君王避暑幸離宮，玉柄輕搖水殿風。不知羽蓋雲屏下，何似冰天雪窖中。咸淳宰相尤兒戲，內家法物何年賜。輕褻偏教狎客攜，玉璽猶鈐

---

自有特色。他們以〈宋徽宗玉璽歌〉為例，指這首詩歌寫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考證寫得饒有興味，非常符合袁枚對考據詩的審美要求。寧夏江、魏中林：〈袁枚對乾嘉詩壇學問化風氣批評的矛盾性和妥協性〉，《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2010年8月），頁85-89。

<sup>45</sup> 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冊，卷8，頁187。

紹興字。一戰荊襄百事灰，半閒堂上月徘徊。涼風未報秋蟲死，冷露先驚白雁來。南渡風流賸如此，中邊猶拓澄心紙。可惜如珪有玷存，麓邨一印難湔洗。我朝仁風被八埏，不求古物惟求賢。寧教零落波斯市，敢逐南薰進御筵<sup>46</sup>。

二首詩也以賦為主，寫于闐玉和宋宮團扇的流落古今，堆疊大量地理和空間、歷史與人事。這些賦寫內容，跟詩題對象的關係很微妙，未必是古物的「真實經歷」，更多是詩人按于闐玉及宋宮團扇的特點來借題發揮。詩中對史事間有評騭，如唐玄宗天寶年間征伐大小勃律、宋徽宗大觀二年詔鑄新璽、宋室南渡後朝廷的靡弱不堪等，也有對清朝的讚美，甚至反諷與寄托，但這並不等於借物咏史，也不能看成頌詩或者抒情詩。古物是這類詩的主角，史訓、頌讚與寄托僅為附帶，也不深刻，卻無疑提高了詩歌的學術氣息。

試比照考訂家的考訂詩，可發現相似的詩形和作法。例如翁方綱〈唐銅魚符歌陰曰潭州第一〉亦有相似詩形，以古物為中心，以賦為作法：

騶男昨見符五虎，潭州今見符一魚。我聞佩符銀與玉，亦分左右班相臚。或三或五茲弗著，所謂右一其然歟。有唐符掌門下省，皆承敕牒於尚書。函封寫勅並鈐押，以辨出納防詐狙。竹使何年換銀菟，武德疆場資耘鉏。寸金左券作筦鑰，千里響應馳軺車。飛芻輓粟立徵召，間關重驛通象胥。青龍朱雀次以亞，交魚巡魚遞所儲。鱗介之祥並元武，不獨垂佩鏘鳴琚。晉陽龍飛杖黃鉞，隋宮六璽來玉輿。羅川縣令儼梁裔，岳州異鳥翔隼旗。襄巫夏口軍四集，三十六派湘流瀦。

<sup>46</sup> 孫原湘著，王培軍點校：《孫原湘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中冊，卷17，頁589-590。

潭州大開都督府，洞庭橫亘連荆舒。北拱京畿二千里，南通交廣三苗餘。周旋復始始第一，水剽犀兕山夔魑。後來馬家表銅柱，那復帶礪追盟初。古戍城樓切碧麓，牙旗壁壘環周陸。沙邊弔古拾戰鏃，茫茫野塚猶遺墟。廉州曾記潘氏得，同字宛爾陽文如。一寸六分識黍尺，周尺宋律非齟齬。考古續圖定可補，魚鱗活碧誰所漁。當年折衝鎮守物，今日研北憑嗟歎。鎮書木簡差可代，附緘雙鯉果有諸。楷法蒼然輩歐褚，四字已抵千魯璵。惜不摹入潭州帖，却對臨汝增躊躇。<sup>47</sup>

就考訂詩的詩形和作法而言，性靈派詩人的考訂詩與考訂家比較，只是精深程度、考訂功底的分別。古代兵符又稱虎符，唐代改稱魚符，用以傳帝命令或調兵遣將，也是官員出入官門的憑證。魚符接受符者身分，分別以玉、金、銀、銅訂製。此詩賦寫銅魚符的外形和用途，除了常識外，亦多引用古籍記載，並就其由隋至唐的演變發揮：青龍、朱雀是隋代的符制，唐沿隋制並作改良，相關記載見《隋書·百官志》、《冊府元龜》、《唐六典》等典籍。「羅川縣令儼梁裔」開始，就魚符上陰文「潭洲第一」發揮，賦寫潭洲在唐代的交通、歷史、戰略如何重要。「廉州曾記潘氏得」之後再寫魚符的陰文和尺寸特點，夾以古物之重要至今卻無用之慨嘆。比較袁枚、孫原湘等人的考訂詩，考訂家翁方綱的詩明顯更具學術性，讀者需要跟從翁氏詩句的指引，聯絡相關典籍，才能讀懂詩的意思；而且書典也更專門、應用密度也更高。不過，這只是程度深淺而已，除非寫的是能夠確認誰人用過的物件，否則翁方綱即使如何引經據典，也無法確實論證古物的實在經歷，這一點跟袁枚和孫原湘等人

<sup>47</sup>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1冊，卷24，頁213-214。

的詩相似；他們以同類為個別，書寫他們通過想像與研究所得的內容。

詩形會影響詩之作法，圈定了詩的標準，同時亦限制了一些元素的發揮。考訂詩對學術性的追求，具體展現在利用書本知識應合想像與研究的層面；在物為中心與知識堆疊下，抒情述志並非必需。從袁枚的詩論可知，他很清楚考訂詩有這些要求，這也不是他的獨見，因為性靈家學問家的考訂詩都如此，是共識。

亦因為這樣，考訂詩很容易與咏物區分，性靈派的咏物詩極多，用他們的詩就更能突顯出其中差異。例如袁枚就有好幾題「咏錢」，茲引兩首：

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  
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  
空勞姹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  
擬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設富民侯。<sup>48</sup>

又：

百物皆可愛，惟錢最寡趣。生時招不來，死時帶不去。<sup>49</sup>

咏物詩篇幅較短，以趣以巧勝，所寓之思想教訓亦較深刻。再如另一位精於咏物，同樣不避考訂詩的舒位（1765-1816），他的咏物詩也典型地咏物寫志，如〈破被篇〉：

讀書萬卷讀不破，走入破被堆中卧。雞既鳴矣凡幾聲，蝨其間者凡幾箇。或曰屣可棄，我不忘其敝。或曰袞可補，我非

<sup>48</sup> 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詩文集》，第 1 冊，卷 13，頁 279。

<sup>49</sup> 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詩文集》，第 2 冊，卷 35，頁 982。

五雜組。不相離別轉相親，我用我法橫自陳。芙蓉城裏蒙頭入，鸚鵡洲邊伸脚出。一年又一年，春秋冬夏無不然。萬里復萬里，東西南北而已矣。蜀錦重重無片段，吳綿團團逸其半。參來羅漢五百尊，幻出觀音十一面。彈斷銅琵琶，披出鐵袈裟。石破天驚逗秋雨，中有殘夢恒河沙。君不聞湖州唐六歌有口，又不見揚州朱八畫有手。唐猶及見未破時，朱獨相憐已破後。今茲襍被春明門，車如雞棲馬如狗。黃竹箱中什襲藏，青苔榻上周旋久。被兮被兮可奈何，世間破被有許多。安得盡遣朱八作畫唐六歌，我乃化爲蝴蝶夜夜飛天魔。<sup>50</sup>

雖以歌行出之，但作者的聲音突出，借物為了抒情，破被所寓詩人之命運才是詩中的主題。咏物詩與考訂詩都可用賦，然咏物詩之外形描劃為了觸發聯想，典故與知識用以深化歎喟，抒情的重要性明顯高於書本知識與考據。袁枚和性靈派詩人都有這兩種詩，他們撰寫考訂詩時，也沒有跟咏物詩混淆，可知他們是具有清晰的文體意識的。

文體意識包括文藝觀念。考訂和咏物的區分，表示了詩人從咏物寫志、寫物抒情的抒情傳統中另闢蹊徑。那麼，這是炫學行徑嗎？如果僅學問家寫，可能是。正是有這麼多人都寫，尤其是批評學問家炫博的性靈家也寫，這種詩才不能簡單地以此定論。

#### 四、考訂詩與比興傳統的關係

清人從作法上自覺區分考訂詩與咏物詩，然而考訂詩從未成為獨立一類，以古物為書寫對象，使今人多歸入咏物、咏史、題畫等

<sup>50</sup> 舒位著，曹光甫點校：《瓶水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冊，卷10，頁388。

類討論。例如論者研究吳錫麒詩歌，將〈岳忠武王銅印歌〉、〈蜀鏡詞〉放入咏物及詠史裡探討<sup>51</sup>；翁方綱的研究很難迴避以金石入詩的作品，論者多置於詠物詩、題畫詩等類別分論。<sup>52</sup> 即如袁枚為清詩之大宗，研究者對袁氏之考訂詩的討論都非常簡潔。王英志留意袁枚「在藝術上，他有少量詩亦有喜歡賣弄學問，採用生僻典故，使人難以索解，失去白描本色」，惜沒有舉例；<sup>53</sup> 張健《袁枚詩新論》有器物詩一章，列舉袁枚詩曾書寫的各種器物，並附簡要說明。該章結語云「袁枚器物詩描寫外貌的成分少，寫精神者多，常有言外之意，身外之概，象徵筆法時有所觀」，<sup>54</sup> 該書僅選〈簡齋印〉一首五古考訂詩，其餘多是律絕咏物，以言外意作寫作特色歸納是可以理解的。

今人將考訂詩歸入咏物、咏史或題畫，這不僅是分類問題，更值得注意是由評鑑標準所反映的創作論問題。考訂詩著重「賦」的寫法，無法滿足以咏物、咏史眼光審視的讀者；畢竟「賦」與「興」的消長關係，在清代已有頗固定看法。陳僅（1787-1868）《竹林答問》有許多對於「賦」、「興」關係的評論，其中有：

古人之咏物，興也；後人之咏物，賦也。興者借以抒其性情，詩非徒作，故不得謂之咏物也。自擬古詩興而性情偽，自咏物詩興而性情亡。其能於擬古、咏物見真性情者，杜老一人而已。<sup>55</sup>

51 劉歡萍：《乾嘉詩人吳錫麒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頁210、215-216。

52 唐芸芸：《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21-227。

53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22。

54 張健：《袁枚詩新論》（臺北：文史哲，2012年），頁292。

55 陳僅：《竹林答問》，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

看來，詩以能抒性情為優，咏物以興為尚，也是因為「詩非徒作」，必須得見作者性情。不過，詩道性情並不能決定詩的好壞，因為考據家的支持者同樣大倡考據之詩能見學問、學問就是性情。性情的真偽固然值得關注，但是以「興」抒性情，才是寫物之詩的正道，陳僅帶出的其實是詩的作法問題。從這簡短言說中，無法確知「後人之咏物」具體指什麼，是否包括當下之咏物，但他推崇「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嘗試追蹤清人對「賦」、「興」對舉的討論，就會發現「興」重於「賦」是重覆演繹的觀念，而「比」與「興」往往是作為一種具備優越價值的作法一同出現的。例如吳喬（1610-1694）曾辯析詩文之界，指詩宛文直，「賦為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詬父母矣」；<sup>56</sup>馮班（1602-1671）批評李東陽之詩「引繞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sup>57</sup>張謙宜（1650-1733）云：「古人文章各有體裁，若令詩專主於理，不主於比興風雅，即何不為有韻之《四書》、《五經》，而須後人之叨叨置喙耶？」。<sup>58</sup>「比興」引進為詩文辯體的標準，得之為合，「賦」之過度使用反而會被視為失體，這種說法在清代已是常識，吳喬甚至以「比興」定詩句之死活，因為「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為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sup>59</sup>

---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2245。

<sup>56</sup> 吳喬：《圍爐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卷1，頁479。

<sup>57</sup> 馮班：《鈍吟雜錄》，收入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9。

<sup>58</sup> 張謙宜：《緝齋詩談》，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卷1，頁792。

<sup>59</sup> 吳喬：《圍爐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



言辭雖較激切，但在詩的範疇裡，「比興」的重要性較「賦」為高已廣為清人接受。這種觀點非由清人創制，《文心雕龍·比興》篇早肇其端，劉勰大量援用《詩經》及漢魏詩賦為例，說明他是在文藝創作而非經學的語境下論「比興」的重要性。「觸物圓覽」到「擬容取心」，<sup>60</sup> 導引出「物」與「心」必須溝通無間的創作理想，而「比興」正是完成此理想的創作方法。

這種標準，自然「指導」了「物」進入詩歌寫作範圍時的要求：咏物詩「隨物賦形」、曲盡其妙、「如印之印泥」並不足夠，還必須講「比興」，實現「托物寄興」、「感物興情」的抒情目的，才算理想。薛雪說：「咏史以不著議論為工，咏物以托物寄興為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sup>61</sup> 楊際昌云：「咏物詩有刻劃唯肖者，有淡遠傳神者，總以情寄為主，風格佐之，乃不失比興之義」，<sup>62</sup> 這都表示咏物詩不能停留在刻劃層面，須有「寄興」／「情寄」，也就是要做到「不黏不脫」、「不即不離」。蔣寅和陳昌明在這方面發表過重要研究成果，蔣氏指出「不即不離」、「不黏不脫」在乾嘉咏物詩寫作已是常識，咏物要切、要有勾勒，同時追求寓意。而當時也出現過咏物寓意與不即不離的矛盾反思，及將古代咏物詩的寫作動機全歸於比興的絕對化言說，他認為這些討論突出和強化了

---

卷 1，頁 481-482。

<sup>60</sup> 劉勰著，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譯注（修訂本）》（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510-513。

<sup>61</sup> 薛雪：《一瓢詩話》，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704。

<sup>62</sup> 楊際昌：《國朝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冊，卷 1，頁 1684。



詠物詩的抒情傾向<sup>63</sup>。陳昌明則以「觀象」切入詠物詩之寫作方式，指出詩歌是不可能呈現物之全貌。故在語言技巧方面，一方面迫肖形似，一方面避免呆板粘滯；而詩人會自選詩歌「成形」方式以表達情感，使「寄託」成為詠物詩必走的方向。值得一提，陳氏論述了詠物詩這種寫法對詩歌發展史的意義，他認為詠物詩的成熟，確立了個人的生命質性去認識和肯定情性就是文學的生命和本質；在此之前，個人情性是很難獨立於家國社會之外的。他又指：

詠物之作把詩歌從邏輯的思索中解放出來，訴諸一個感性的世界，並且給予讀者一個臨即感——詩歌中的絕對時空。也即是，物象本身所給予讀者的感覺，塑造了一個永恆的典範。<sup>64</sup>

陳氏的論述解釋了「比興」為何在創作手法上有更高級的價值。回顧清人論「物」與「比興」，往往帶有「內在化」(internalization)特點，即不說而自明。如方苞「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眾皆見為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sup>65</sup>也就是作者即使不說，「西山之梅」的特點也必然寄寓作者之情性。這種「自比其體」思維，可以說是提高了詠物詩的解讀效率，明確了以寓托解詩的方向。朱筠箋古詩十九首時說：「詩有性情，興、觀、群、怨是也。詩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詩有比興，鳥獸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盡於此三

<sup>63</sup> 蔣寅：〈「不粘不脫」與「不即不離」——乾隆間性靈詩學對詠物詩美學特徵之反思〉，《人文中國學報》，第22期（2016年5月），頁49-72。

<sup>64</sup> 陳昌明：〈游於物——論六朝詠物詩之「觀象」特質〉，《中外文學》，第15卷第5期（1986年10月），頁139-160。

<sup>65</sup> 方苞著，劉季高校點：〈題舒文節探梅圖說〉，《方苞集·集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冊，卷4，頁636。

者矣，後人咏懷寄托，不免偏有所著」，看似重申儒家詩說，然而重點卻在「盡於此三者矣」，因為「性情」、「倚托」與「比興」是詩之所以為詩，後人「咏懷寄托」之標舉就不免多餘了。陳廷焯（1853-1892）云「風騷有比興之義，本無比興之名，後人指實其名，已落次乘，作詩詞者，不可不知」，<sup>66</sup>比興乃詩詞本然具備的。再如劉熙載（1813-1881）引述李仲蒙之語：「『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托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不兼具比興之意」，<sup>67</sup>「物」是「言情」、「托情」、「起情」之門，「情」內化在「賦比興」之中。故此，寓托性情乃咏物詩的內在化特點，正如林淑貞認為咏物詩有「體物瀏亮」和「託物言志」兩系列，以後者為主流。而「託物言志」其實就是一種「文外重旨」，也是「言外意」，用現代語詞來說，就是「寄託」。<sup>68</sup>葉嘉瑩認為中國有「感發的傳統」，「『賦』、『比』、『興』三名所標示的實在並不僅是表達情意的一種普通的技巧，而更是對於情意之感發的由來和性質的一種區分」。<sup>69</sup>知之，則知清人如何判斷咏物詩的好壞，再看《竹林答問》的另一則叔姪對答：

問：咏物詩何道為貴？

<sup>66</sup> 陳廷焯著，杜維沫校點：《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卷6，頁158。

<sup>67</sup> 劉熙載此則在〈賦概〉第4則，他此章起始論詩與賦之關係，故從賦、比、興引入。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6。

<sup>68</sup> 林淑貞：〈寓意、符號與敘寫技巧——論寓言詩與敘事詩、詠物詩、賦比興之交疊與分歧〉，《興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6年12月），頁27-62。

<sup>69</sup> 葉嘉瑩：〈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例說：從形象與情意之關係看賦、比、興之說〉，《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35。

答：咏物詩寓興為上，傳神次之。寓興者，取照在流連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興也。傳神者，相賞在牝牡驪黃之外，《三百篇》之賦也。若模形範質，藻繪丹青，直死物耳，斯為下矣。予嘗評友人詩云：「詩中當有我在。即題一畫，必移我以入畫，方有妙題；一咏物，必因物以見我，方有佳咏。小者且然，況其大乎？」此語試參之。<sup>70</sup>

無疑，「比興」、「因物以見我」已成詩家自覺遵守的法則，體現在咏物詩的創作與評鑑上。考訂詩以物為對象，很自然會被認作咏物詩，論者亦自然以以上法則去評鑑。唐芸芸研究翁方綱的詩歌，有以下一段話：

詩歌最常見的寫作物件是金石、碑版、書畫等，這在傳統的詩歌創作中屬於詠物詩。詠物詩常用的方法，就是比興。我們不是為寫物而寫物，而是通過對物的描摹，或抒懷，或寄意。而翁方綱在處理描摹「物」的部分，堅持採用鋪排，就是「賦」的方式，而且還堅持從「正面」入手，直擊「物」本身，實則與傳統的詠物詩已經大相徑庭。<sup>71</sup>

在咏物詩所「內在化」的強大「比興」法則跟前，考訂詩無法達到標準，被貶抑排斥是意料中事。洪亮吉曾撰論詩絕句評考證入詩之風氣：

只覺時流好尚偏，并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草都刪卻，長短

<sup>70</sup> 陳僅：《竹林答問》，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冊，頁2245。

<sup>71</sup> 唐芸芸：〈翁方綱詩歌「以考據作詩」辨——兼論「事境」說〉，《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3期（2017年5月），頁112-119。

卻摩擊壤篇。<sup>72</sup>

一般以為這絕句針對翁方綱，但查考這二十首論詩絕句，若針對具體詩人，詩末會有小字具名，不具名的則為批評風尚，此首即為後者一類。這首論詩絕句之「美人香草」就是「比興」法則，而詩人不會不知，只是他們選擇「刪卻」，而去取法邵雍的〈擊壤歌〉。洪亮吉自然不喜這種作法，但他卻覺得時人是刻意這樣做的；而首兩句亦說明了這種作法是當時的「時流」，印證了本文描述的情況，即考訂詩在當時是種風尚，儘管性靈派詩人也難以自外於此。故此，咏物和考訂是兩種不同規範、不同要求的詩類，清人並沒有相混；洪亮吉批評這種創作風尚，他也沒有混淆這兩類詩，他只是不滿這類詩沒有「比興」而已。將考訂和咏物混淆的不是清人，更不是批評考訂甚激但本身又有考訂詩創作的性靈派詩人。清人對考訂詩的批評，反而說明了他們非常清楚這類詩與咏物詩的區別。那麼，既然他們有意為之，<sup>73</sup> 這些詩被眾矢之的也是意料之內，他們為何要寫這種詩？尤其是自詡清醒的性靈派詩人，他們的寫作動機就更讓人好奇。需知道，詩壇宗匠如袁枚，考訂詩是不會給他帶來好處的，他自信憑其詩文已能不朽，他在當時的地位亦不需要依賴考訂詩來奠定，其交遊之闊亦跟考訂詩無甚關係。那寫作這種跟比興傳統牴牾的考訂詩，無疑是一種寫作實驗了？

假如承認考訂詩是有別於「比興」為尚的詩，那將寫作文化背景、比興傳統前景化，只會模糊考訂詩在創作本身的創新，並

<sup>72</sup>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洪北江全集·更生齋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冊，卷2，頁1146。

<sup>73</sup> 王濟民論翁方綱的以經史考據入詩時，認為翁是有意為之，然未及深入探討。王濟民：《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詩學》（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48。

理所當然地否定這種詩歌；因考訂詩根本不以「托物興情」或「比興寄托」為寫作旨歸。綜觀對考據入詩的討論，論者歸納其為反映乾嘉時代的文化產物，同時援用行之既久的比興標準去批評這種詩歌，指斥其「吞噬詩人的情感，造成詩性的迷失」，<sup>74</sup> 詩歌枯燥乏味，<sup>75</sup> 禍害了一整代的詩壇。<sup>76</sup> 這種嚴重指控站在維護比興傳統立場上，自有其合理性，正如袁枚論詩與儒家詩說之重視社會功能不同，但他作詩的「風雅之懷」也是發揚「詩可以興」的感人的審美功能。<sup>77</sup> 林淑貞論咏物詩時說，以言志抒情互相融攝為基礎，總言之抒情為

<sup>74</sup> 寧夏江認為，在清代學術思潮的背景下，詩歌作為複合型文化的載體，不可避免地做了樸學的策應工作，於是出現了以金石考據等樸學內容入詩的情況。並說以考證思路與方法入詩，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詩人的獨創精神，進而吞噬詩人的情感，造成詩性的迷失。考據式的思維方式壅塞了詩人的創造力、領悟力，窒息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的詩歌創作缺乏唐詩那種想象、凝練和跳躍。詩性的缺乏是造成乾、嘉詩壇啾緩疲軟的一個原因。寧夏江：《晚清學人之詩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7。

<sup>75</sup> 如趙鴻飛研究黃仲則詩歌時，對翁方綱的學問詩和黃仲則的學人之詩評為「質木無文、枯燥乏味」，而對照的則是「一無依傍，抒寫性靈」的才人之詩。趙鴻飛：《俯仰悲歌——仲則與乾隆詩壇》（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264-265。霍有朋說翁方綱這些詩歌雖有事境而無意境，毫無審美價值可言。霍有朋：《清代詩歌發展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78。

<sup>76</sup> 錢鍾書就稱乾隆、錢載、翁方綱之詩為「惡詩」，「兼酸與腐，極以文為詩之醜態者，為清高宗之六集。蘊石齋、復初齋二家集中惡詩，差足佐輔，亦虞廷賡歌之變相也」。錢鍾書：《談藝錄》，頁78。嚴迪昌認為翁方綱詩的習尚在後來的同光詩人仍有承沿，是詩之一厄。嚴迪昌：《清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654。劉世南說翁方綱並未有吸收前人的優點，反而帶壞了錢載。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347。

<sup>77</sup>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485。

優秀詠物之充分條件。她引述古人論說，證明古人亦以此為詠物好壞指標，即使詠物範圍有寬有狹。該書亦引用鄭毓瑜、顏崑陽之說，其中後者點出「托喻」有連結作詩、讀詩、賦詩、教詩整個文化活動。<sup>78</sup> 這種說法甚有啟發，當思考考訂詩的不類咏物時，若以咏物衡之，其實也關涉整個詩歌創作傳讀的文化活動，既讓我們容易理解為何考訂詩會不受讀者論者歡迎，又使考訂詩跟咏物及比興傳統之「緊張關係」呈現人前。它試圖擺脫比興傳統，但又不得被這傳統覆蓋。當這種詩歌大量出現時，是僅僅增加淘汰的量而已？我們該如何思考這種特殊的寫作現象？性靈派對考訂詩的曖昧態度，正好說明了這種詩歌不是毫無寫作價值的冗詩，亦提醒了我們不必將文學史和詩歌分類之定見，如影隨形地套在考訂詩上。這些詩跟定見之不和諧處，正是它們的生命光華所在。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不顛覆比興原則，詩之園地都可以包容；可是，如果考訂詩要實驗的是對比興原則的顛覆呢？

## 五、零度寫作與不朽追求

本文認為，對照其他詩形，考訂詩可以說是一種接近「零度」的寫作。詩歌固然增添許多學問、書本，材料，也減去了極多性情抒發的空間，但不能因這些詩有幾句抒情感嘆，就自然地說考訂詩跟其他詩歌類型同屬。倘從抒情於詩歌的重要性、篇幅比例、焦點上看，即使是理學家的性理詩、擊壤體也沒有像考訂詩這麼極端。<sup>79</sup>

<sup>78</sup>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托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頁36-47、284-288。

<sup>79</sup> 陳國球指出邵雍的詩歌，其實跟他在〈擊壤集序〉所述之旨趣不完全吻合。邵氏的詩歌雖然談性理、宇宙，但個人抒情卻非常強烈且易見。他把「物

性情的減褪，情感的退避，反襯了對物的觀察的精細、冷靜與客觀，七古或歌行的篇幅汗漫，亦使考訂和抒情處於更懸殊的比例。無論學問家還是性靈家，他們都清楚這種情況，但他們也選擇跳進這個「圈套」，讓詩情受到很大的束縛。回看袁枚論考訂詩那則詩話，他說「考據之學，離詩最遠」，又說「聖人編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何也？以《國風》近性情故也」。在他心中，考訂詩離性情最遠，但不等於沒有性情，只要詩人有其他更近性情的詩作，寫考訂詩其實不妨。

他曾說詩歌需要發抒性情，說考據和詩歌最不合，又自言考據讓他性靈板滯，那他還要寫考訂詩，到底性情在什麼地方？他肯定自己不是考訂家，考訂不可能是他的性情。跟學問家不同，學問家可以說自己的性情在考據，考訂詩符合其性情。所以，袁枚和性靈派人從事考訂詩寫作，親身參與了這場挑戰比興傳統的詩歌實驗，反而讓我們能更公正地審視這種現象。

也許，性情就在顛覆比興傳統的詩歌實驗中。從袁枚跟孫星衍的書信討論可見，他的詩學理念其實相當傳統，前文提到他處理「考據」與「詩」的第一種關係，即互不相干，清楚各自邊界，不能誤入。他也曾多次闡述「詩重性情，不重該博」的主張，表示人各有性，詩言性情的原則。這些「傳統」早已牢牢扎根、舉目皆然，對袁枚來說，合與不合都是焦慮，詩人身分的喪失是嚴重污名，唯有這樣才能理解他勸孫星衍從考據裡回頭是岸的動機——他對好友詩才

---

情」鍊得視為自我修為的表現，在〈序〉大言正道的嚴肅面孔下，其實有活潑的詩情。陳國球：〈煅鍊物情時得意，新詩還有百來篇：邵雍《擊壤集》詩學思想探析〉，《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第5期（1998年），頁33-52。



的喪失感到不安、悲痛。所以，袁枚撰寫考訂詩時，肯定意識到詩才喪失的危機；「傳統」就在眼前，寫作考訂詩時必須抵抗這個「傳統」，保護詩才喪失的危機意識，必須維持一種冷靜（冷酷）的「非我」狀態，壓抑著情感，才能接近「零度」地書寫。<sup>80</sup> 有趣的是，無論是學問家還是性靈家，考訂詩若有我、若有情，幾乎都集中在詩的尾聲。固然，我們可以將之看作考訂詩之形式特點，但形式以外，是否能尋繹更多意義？正如高友工的七律美典論，也是從律詩的形式探究起步，結果深入了中國抒情傳統的內在結構。<sup>81</sup> 考訂詩尾聲的抒情（如果有），許多時在情調上與詩的前面部分的冷靜極不協調，情感有時甚至噴薄而出。考訂詩的詩形製造的壓力愈大，性情的「抵抗力」就愈大，「回歸」的方式也愈突兀。

文人希望不朽，希望作品傳世，嚮往身後名。袁枚多次述說「考據」與「詩」的第一種關係，有時就兼及傳世的思考。他認為各依性情，專精則傳：「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忘卻自己應有的立足點，是注定失敗的。能否傳世，就是驗證成敗最功利也最現實方法。袁憑考訂詩以外的詩文，足以傳世。相反，

---

<sup>80</sup> 這裡借用了巴爾特（Roland Barthes）著名「零度的寫作」論述，對作者進行零度寫作的狀態時的描述。羅蘭·巴爾特著，李幼蒸譯：《零度的寫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6-49。

<sup>81</sup> 可參高氏〈律詩的美典〉、〈中國抒情美典〉及〈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等文。陳國球指，高友工受蘇同穌及沈剛伯兩位老師，和分析哲學的方法論的影響，展開其唐詩研究，用力於分析哲學之所未及之境，對人文活動中的經驗和價值作仔細推敲，後來以「文體」結構作為「抒情精神」載體，寫成〈律詩的美典〉。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頁90-107。關於高友工〈律詩的美典〉談及的律詩內在結構及文化理想，可參徐承：《高友工與中國抒情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81-216。



他大概也知道考訂詩很難傳世（即使他自認用「詩」與「考據」的第二種關係來寫詩，即源流根葉），所以在詩話裡才會有「必置之於各卷中諸詩之後，以備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撐門面；則是張屏風、床榻於儀門之外，有貧兒驟富光景，轉覺陋矣」之話。到底考訂詩寫作能帶來多大的自虐下的快樂，才能讓他們放棄傳世念頭而繼續寫作？或者，這些詩對他們有怎樣的重要價值，值得作這種「機會成本」的操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發現唐人很少寫傢俱、瓷器，但杜甫、白居易的相關作品卻保留下來了。留下的原因不是這些詩寫得特別精彩，只是詩人刻意保留文本，作為完整詩集的一部分而已。他進而指出，這些詩歌不僅寫物，它們也是物質本身，作為一種被作者觀看的文本存留。<sup>82</sup>清代考訂詩的寫作語境跟唐代不同，咏物在唐代尚未固定地以比興為尊，詩人對物的態度因其身份與經濟條件而變化，他們從而自由選擇不同寫物方式，並不會因為詩乏比興而產生壓力。但在清朝，無論貴賤貧富，詩中寫物總不能迴避比興傳統的影響，考訂詩不是咏物詩，較之唐代，寫物的技巧自然有所發展，但選擇寫物方式的背後卻增加了來自詩學傳統的壓力，使詩人不能不考慮「比興」的選項和評判。這是為何本文會視考訂詩乃對比興傳統的反撥的原因。

袁枚的預言是準確的。考訂詩在寫作風潮過後，迅速消失在讀

---

<sup>82</sup> 宇文所安以物質、財產、物等觀念處理六朝至唐的詩歌裡對物的書寫，他指出物與人的關係不斷變化，烏皮几之於杜甫，由一件普通物事，逐漸轉喻以成為詩人生命整體緊密相關的一部分。他引入「所有權考古學」概念，點出人對物的態度與情感關乎到詩人的身份，佔有、獲取、放棄等都與詩人的身份和經濟條件有關。宇文所安：〈文本的物質性和文本中的物質世界〉，收入陳珏主編：《唐代文史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1-33。

者的視域。我們只能通過資料整理、編集的情況下，才能讀到考訂詩。翁方綱將關於九曜石的考訂詩編於《粵東金石考》附錄，活躍於嘉道的甘熙將金石考訂詩編成《金石彙選》，同時期的馮登府為紀念雅集而編《石經閣鄭硯唱酬集》等等，都是試圖通過「記錄」方式來使之傳世，而不是憑依詩的趣味和文藝性。所以，翁方綱《復初齋詩集》考訂詩充盈，到了清末已經沒有多少讀者。民國以來的清詩選及清詩人選集，也不見考訂詩踪影，今人論述清詩或詩人詩風時，亦往往不甚注意這種詩歌，或者歸之於咏物一併討論。這些都似乎論定了考訂詩無法擁有獨立的文藝地位。「傳統」擺在這裡，「傳統」一直延續，「傳統」有利建立文化自信，但「傳統」同時遮蔽了多了色彩？本文用袁枚和性靈派角度討論考訂詩，正因為他們可以「減去」學問家執著的諸種原則，例如考訂水平的高低、學問的洋溢、以考據不朽的想像等等，反而讓我們更容易認識到考訂詩寫作的價值可以別有所在，也提醒我們，需要暫時移開先人為主的格局和規範，才能比較接近地認識他們的創作語境和關懷。

紀錄本身就是意義，袁枚和性靈派中人也許只是享受創作時所經驗的自虐的快感。考訂詩的書寫對象是古物，恰巧袁枚也有三篇〈玩古者說〉。在文中，他表達「玩古」的最好態度是觀察，是不追求名，是不強為解，否則古物寧願不被發現，在泥土中腐朽。他對「世之玩古者」多有批評，對象直指考據家。袁枚表達了一種對古物不加干預的態度，人並不比「物」優越，這同樣也是一種抵抗時流的觀點；此外，他也有散書，以防考據家以書備參考的舉措。<sup>83</sup>袁枚的看法多半不為考訂家認許，因為考訂家自信全因有他們的考

---

<sup>83</sup> 見〈散書記〉、〈散書後記〉二文。袁枚著，周本淳校點：《小倉山房續文集》，《小倉山房詩文集》，第4冊，卷29，頁1776。

據，物才能流傳，而考訂詩的力求客觀、接近「零度」的寫作也與這種「觀物態度」若合符節。詩人習慣退後幾步，讓古物自說自話（外形），演說它的經歷，敘述它所見證的歷史，然後詩人才在詩之尾聲介入，為它的際遇和命運感嘆一番。「物」的歷史遠比個人的歷史悠長，人事紛紛反而為「物」所見證。雖然，嚴格來說，再客觀的書寫，也很難撇除主觀想像。古物的故事始終由詩人去寫、去聯想，材料的調度也由詩人，詩人的主觀意志，早就在「紀錄」的過程介入了。是以考訂詩尤多對古物與人事的遇合表示共鳴和感嘆，袁枚〈商丁孫尊歌為素將軍作〉云「我乃撫尊長嘆息，世事輸君常八九」、〈海南雙門觀銅壺滴漏作〉「老我摩挲有所思，壺中日月過來遲」等，<sup>84</sup> 趙翼〈梁製觀世音像歌〉云「我獨摩挲為太息，重是千年尚完璧」、「豈必有神為呵護，世久自覺堪愛惜」等。<sup>85</sup> 詩人摩挲古物時，無法抑止對其重現人間的感動；既是命運，亦唯人力。古物的隱匿與被發現，本身就很容易接上詩人的共感——對遇合的渴望、自由的追求，本乃人之常情。

袁枚的考訂詩在詩歌傳播中理所當然地被忽視，但有趣的是，被認為是調和學問和性靈二家的張維屏，他的《國朝詩人徵略》「袁枚」部分列出了他所認許的代表作，其中竟然有〈商丁孫尊歌為素將軍作〉<sup>86</sup>，這在袁枚研究史、閱讀史上是極罕見的；而且，他於七古的另一選擇〈觀大龍湫作歌〉，乃袁枚的七古名篇，亦廣為現代的詩選收錄。張維屏進行這種「紀錄」時，已是考訂詩強弩之末

<sup>84</sup> 袁枚著，周本淳校點：《小倉山房詩文集》，第1、2冊，卷15、卷30，頁349、811。

<sup>85</sup> 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第3冊，卷39，頁1271。

<sup>86</sup>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2冊，卷30，頁590。

的時期（初編在嘉慶二十四年編成），他到底在思考什麼、希望保留什麼呢？

## 六、結論：在邊緣裡推求價值

考訂詩是一種接近「零度」的創作，它不在揭露寫作對象的真相（無法考證真正經歷），而嘗試聚焦寫作對象的主體。作家的主體並不比對象的主體更優越，這是一種大膽、創新的實驗詩。袁枚對「物」有獨特看法，他對考據入詩有源流根葉的看法，使他從理論上支持了這方面的詩歌實驗，這便於我們理解考訂詩的獨特性。

這種實驗詩並未有充分條件的土壤去發育滋長，形式化的尾巴反證了比興傳統的強大影響、後來的評詩選詩者的無視，亦證實了考訂詩無法為詩學現實包容。乾嘉之時，除了袁枚外，罕見對考訂詩的正面討論。袁氏認為考訂詩置於集中，不佔主導倒不妨事；考訂詩大宗翁方綱，擬將考訂詩置於詩集外集，使之跟「性情風格氣味音節得詩人之正」的內集區別開來；<sup>87</sup> 洪亮吉等以比興或者咏物標準批評考訂詩等。考訂詩不斷被邊緣化，固然足見詩家難以挪用既有詩論框架去討論考訂詩，但反過來說，也可以證明他們仍在努力尋找考訂詩的詩學位置及研究方法。考訂詩先天上跟比興傳統關係緊張，若要公開宣告考訂詩的理論是困難重重的，因為這會衝擊

---

<sup>87</sup> 吳嵩梁曾記曰：「覃溪師論詩，以杜、韓、蘇、黃及虞道園、元遺山六家為宗。全集多至五六千首，嘗命余校定卒業，余請分編為內外集，性情風格氣味音節得詩人之正者為內集，考據博雅以文為詩者曰外集。吾師亦以為然。第云：吾集現已編年排錄，賢友所論須於身後選定，別為鈔版。」吳嵩梁：《石溪舫詩話》，收入杜松柏：《詩話訪佚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7 年），第 3 冊，頁 15。

深嵌詩歌傳統的比興原則。正如亞瑟·梅爾澤（Arthur M. Meizer）研究「隱微寫作」時，認為作家的理性主義一旦公開傳播，便不可避免地通過推翻政治世界的神話和傳統而危害這個世界，故他們選擇了隱微主義。<sup>88</sup> 考訂詩作者亦然，他們只能通過創作，用實在的作品去展示遊離於比興以外的可能性。考訂詩寫作到底有什麼價值，詩人沒有講（也許是沒法講），故本文討論至此也無法作出明確判斷，只能從詩形引伸出其對詩學傳統的反撥與挑戰，反證這套傳統之強大。所以，考訂詩是難以得名、難以分類、難申理論的詩類；大量作品，因此無法留名。現今學界對這課題的研究還很初步，僅就數量言，筆者經眼的乾嘉考訂詩就在千首以上。大規模參與實驗詩歌寫作，本身就表示對抗衡比興傳統下作新嘗試的認同；考訂詩的價值與書寫意義不只是詩句裡堆疊的知識和資材，而是「字裡行間」跟咏物詩相比照下之不同與獨特，因為前者根本無待於詩歌、埋首文章著述就好。如何解讀這種不是偶一為之、屬於跨派別的寫作現象？讀者閱讀這種詩時正像進行「奇怪的嗅診測試」，<sup>89</sup> 以合與不合比興傳統來二元判別詩歌優劣是合乎情理的表現，但嘗試賦予這奇異的聲色氣味另有所在的意義，也是文學史家和詩學研究者的重要任務。張維屏嗅出了奇異聲色氣味，沒有直接論述，補充也沒有，但他將袁枚的考訂詩紀錄在《國朝詩人徵略》詩目，已有存而待論的意思。清人為考訂詩所作的工夫，不能僅以考訂詩不受歡迎的結果去成敗論英雄，他們嘗試變通、嘗試以或正或反的評鑑去

<sup>88</sup> 亞瑟·梅爾澤著，趙柯譯：《字裡行間的哲學：被遺忘的隱微寫作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5。

<sup>89</sup> 亞瑟·梅爾澤著，趙柯譯：《字裡行間的哲學：被遺忘的隱微寫作史》，頁82-86。

保存這曾經流通近百年的詩歌實驗成果，使之不致煙滅無蹤。

無庸置疑，考訂詩的敗退，失去讀者群支持，詩味匱乏是易見的原因。但從創作論角度看，它無法抗衡強韌的比興傳統，才是其無法滋長的關鍵。本文開首提到，以考據入詩的潮流有其當下的文化權力機制作支撐，而考訂詩夭折，卻可見比興傳統的權力機制——收納「近我」如咏物，排斥「非我」如考訂詩。延綿悠久的比興傳統參與建構無邊弗及的抒情傳統，奠定中國傳統文學之基調，但它同時抹去了多少文學上新的可能性？考訂詩也許不是特例。比興傳統在現代依然有效，我們也能接受除此以外的更多藝術可能，這並不代表著傳統的衰落，而是藉以思考傳統如何迎向現代。現在，我們觀察和反思考訂詩的創作和價值，能否得出跟前人不同的結論呢？本文援引羅蘭·巴爾特的「零度書寫」及亞瑟·梅爾澤的「隱微寫作」，並不為了論證考訂詩的先鋒特點、或者說考訂詩暗合於這兩套理論——這只會是一廂情願；筆者只希望抽繹出三者共有之抵抗心理，這是一種渴望與他人不同的追求，是影響焦慮的一種體現。所以，本文反對將考訂詩視作咏物詩，如此收編只會讓這種詩銷聲匿跡，這從清以後的詩選和詩歌史編寫已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在比興傳統的統攝下，考訂詩只會是不合格的咏物詩，它對比興傳統的反撥是不徹底的。除非，它能改變咏物的性質和審美標準，這無疑是癡人說夢。任何的收編者，大概不會給收編對象反客為主的機會吧？

蔣寅發現袁枚「就是這樣一個隨時在顛覆傳統觀念、隨處在翻詩家舊案的角色。翻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傳統觀念的正確性，或提出一個對立的論點，而只是要取消傳統觀念的絕對性，使它們變

成只是可能性之一」。<sup>90</sup>袁枚視考據為詩家大敵，但也寫考訂詩，這看以相悖的行徑，正好為觀察考訂詩的創作論提供批判性視角，從中引伸出比興傳統以外的寫物嘗試。如果有一天，考訂詩能夠在詩學舞台上正式登場，袁枚大概是必須致謝的一位。至於他們寫作的真正動機，可能求遠無法確實探知，因為他們沒有直接言及——是否不便講？不知道，他們留下的，就只有這些違逆比興傳統的詩歌。

---

<sup>90</sup>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學問與性情（1736-1795）》，頁324-325。



## 引用書目

### 一、古籍

1. 司馬遷撰，裴駙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2. 班固等撰：《東觀漢記》，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年。
3. 劉勰著，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譯注（修訂本）》，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5.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6. 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
7.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8.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9. 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10. 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11. 陸遊著，楊立英校注：《老學庵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2. 黃榦：《勉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13. 黃震：《黃氏日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 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14. 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5.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16.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17. 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集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8. 王士禎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19. 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20. 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21. 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22. 何秋濤：《朔方備乘》，《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3. 吳嵩梁：《石溪舫詩話》，《詩話訪佚初編》，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
24.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25. 恆仁：《月山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26. 洪亮吉：《洪北江全集·更生齋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27. 孫原湘著，王培軍點校：《孫原湘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 社，2019 年。
28.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續修四庫全書》，第 16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9.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30.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31. 袁枚著，周本淳校點：《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32. 袁枚著，夏勇注釋：《小倉山房尺牘詳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 年。
  33.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34. 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35.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6. 陳廷焯著，杜維沫校點：《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
  37. 舒位著，曹光甫點校：《瓶水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38. 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39. 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40. 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41. 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42.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

##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
2.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3. 王英志：《袁枚暨性靈派詩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游網絡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5. 王濟民：《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詩學》，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6. 宇文所安：〈文本的物質性和文本中的物質世界〉，收入戴陳珏主編：《唐代文史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7.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李澤厚十年集 1979-1989》，第3卷上，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
8. 亞瑟·梅澤爾著，趙柯譯：《字裡行間的哲學：被遺忘的隱微寫作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9.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托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
10. 唐芸芸：《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11.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12. 徐承：《高友工與中國抒情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3. 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4. 張健：《袁枚詩新論》，臺北：文史哲，2012 年。
15.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6.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7.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8. 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
19.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0. 楊鴻烈：《袁枚評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
21.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22. 寧夏江：《晚清學人之詩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3. 趙鴻飛：《俯仰悲歌——黃仲則與乾隆詩壇》，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
24. 劉歡萍：《乾嘉詩人吳錫麒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
25.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學問與性情（1736-17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
26.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27. 濱口富士雄：〈袁枚と考拠〉，載內山知也博士古稀記念會編：

《中國文人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91年。

28. 羅蘭·巴爾特著，李幼蒸譯：《零度的寫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三、期刊論文

1. 林淑貞：〈寓意、符號與敘寫技巧—論寓言詩與敘事詩、詠物詩、賦比興之交疊與分歧〉，《興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6年12月，頁27-62。
2. 唐芸芸：〈翁方綱詩歌「以考據作詩」辨——兼論「事境」說〉，《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3期，2017年5月，頁112-119。
3. 梁結玲：〈乾嘉學派與袁枚的詩學觀念〉，《文藝評論》，第4期，2011年4月，頁132-137。
4. 陳昌明：〈游於物——論六朝詠物詩之「觀象」特質〉，《中外文學》，第15卷第5期，1986年10月，頁139-160。
5. 陳國球：〈煅鍊物情時得意，新詩還有百來篇：邵雍《擊壤集》詩學思想探析〉，《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第5期，1998年，頁33-52。
6. 葉倬璋：〈文物之光下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政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7年12月，頁103-140。
7. 寧夏江、魏中林：〈袁枚批判乾嘉考據詩風的反封建意義〉，《中州學刊》，第2期，2010年3月，頁222-225。
8. 寧夏江、魏中林：〈袁枚的「詩」「學」觀〉，《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2009年12月，頁17-21。

9. 寧夏江、魏中林：〈袁枚對乾嘉詩壇學問化風氣批評的矛盾性和妥協性〉，《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85-89。
10. 蔣寅：〈「不粘不脫」與「不即不離」——乾隆間性靈詩學對詠物詩美學特徵之反思〉，《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2016 年 5 月，頁 49-72。
11. 鄺龔子：〈自然與中國古典詩歌的理趣〉，《人文中國學報》，第 23 期，2016 年 12 月，頁 31-60。